读史札记

《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的历史脉络

雷　平

近读《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所载张循《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辨证》，该文指出四库馆臣在撰写《〈四书反身录〉提要》时，“明目张胆地篡改原文”，将李颙原著关于吕希哲（原明）坠水不动心故事中的“安坐轿上”改成了“安坐桥上”，“以达成矫诬之目的”，并批评有关研究者对四库馆臣的这一篡改“偶然失检”。此文发表后，苗润博著《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驳议》(《清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对《四书反身录》版本进行考察，指出康熙三十一年李彦瑁的重刊本中，关于吕原明坠水的叙事，已是“安坐桥上”而非“安坐轿上”，而馆臣撰写的提要，即根据其时之“通行之本”。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根本不存在四库馆臣蓄意改篡的情节，所论极是。惟苗文与张文，皆将关注点聚焦在安坐“轿上”还是“桥上”，忽视了“吕原明坠水”这一故事自北宋以来，便在不断被叙说，而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的叙事，不仅在文本上存在差异，而且在评说上也有分歧，而这些差异与歧说正是《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的历史脉络。在这个脉络中，重新观看四库馆臣的批评，就会明白《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的撰著，实有深刻的思想史背景，掩隐着清代思想变迁的重要线索，颇有必要再加讨论。

一、吕原明坠水叙事的演变

“吕原明坠水”这一叙事最早出自北宋徐积《语录》：

> 元符三年，荥阳公（名希哲，字原明）自和州谪居起知单州道，过山阳，因出过市桥，桥坏，堕水而不伤焉。①

徐积（1028—1103）字仲车，楚州山阳人，从胡瑗学。吕希哲（1036—1114）字原明，学者称荥阳先生，少时也曾师事胡瑗，两人皆列名于《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表》。徐积与吕原明较为熟稔，文中又称吕原明坠水为“前日之事”，其所叙当无误。但此段叙事仅谓“桥坏，堕水而不伤”，并未涉及“安坐轿上”与“安坐桥上”的话题。北宋吕本中（1084—1145）所撰《童蒙训》卷上引述了同一段文字用以鞭策子弟。

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与《三朝名臣言行录》中均提及吕原明坠水的故事。《伊洛渊源录》

[收稿日期] 2016 - 09 - 24
[作者简介] 雷平（1979 - ），男，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062；leileiping@163. 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清“学术”内涵的知识转型》，项目号：11CZS032。

① 徐积：《节孝先生文集》卷 31《语录》，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 年，第 719 页。

卷七有云：

> 公之行己，务自省校量，以自进益。晚年尝言："十余年前在楚州，桥坏，堕水中，时觉心动；数年前大病，已稍胜前；今次疾病，全不动矣。"

> 吕荥阳公晚年习静，虽惊恐颠沛未尝少动。自历阳赴单守，过山阳，渡桥桥坏，轿人俱坠，浮于水，而公安坐轿上，神色不动，从者有溺死者。①

第一段文字出自吕氏《家传略》，第二段文字则见于《遗事》，朱子注明出自《吕氏杂志》。《家传略》与《吕氏杂志》皆不见传世，但后世学者如朱熹、黄宗羲等多有引述者。《三朝名臣言行录》在引述两条材料时，坠水故事有两个变化。第一，坠水一事出自于吕原明的自叙，而非徐积所叙。第二，在故事细节上，朱子的叙述多出了"轿人俱坠，浮于水，而公安坐轿上，神色不动"等情节，相较徐积的叙事更加生动形象，给人身临其境的情境化图景。

朱子之后，学者多有述及吕原明坠水故事，但在文本上皆有区别。赵善璙《自警编》卷二"定力"条，全文照录《伊洛渊源录》所引《遗事》条吕原明坠水事。黄震《读史》叙及吕原明坠水时，谓"公习静，至轿卒溺死，不为动"。② 文中之溺死者为"轿卒"，而非朱子所说之"从者"。明代张吉在所著《古城集》中说到吕原明坠水事：（原明）"尝过山阳渡桥，桥坏，舆人坠水，公安坐舆中，神色自若。"③ 刘宗周《人谱杂记·知几篇》叙述吕原明坠水事，其文云：

> 吕原明先生晚年习静，虽惊恐颠沛，未尝少动。自历阳过山阳，渡桥桥坏，轿人俱坠，浮于水。而先生安坐轿上，神色不动，从者有溺水者。其后，先生又尝言，十余年前在楚州，桥坏堕水中时，觉心动。数年前大病，稍胜前。今次疾病，全不动矣。④

这段文字将朱熹引自《家传略》和《吕氏杂志》的涉及吕原明坠水叙事的两段材料拼接一处，在文字先后顺序上则同于《三朝名臣言行录》，而有别于《伊洛源源录》。⑤ 黄宗羲在所著《宋元学案》卷二三《荥阳学案》也提及吕原明坠水事，其中案主传记部分引述的文字接近《伊洛渊源录》卷七所引《家传略》文字，而《附录》中则在引述《吕氏杂志》的文字后续以徐积的《我敬》诗。⑥ 李颙《四书反身录》记有吕原明坠水事。据该书最早刻本，即康熙二十五年刻本，⑦ 其叙吕原明坠水事在文字上与刘宗周所叙甚为接近，除了"虽惊恐危险"之描写不同于刘宗周所说的"虽惊恐颠沛"外，最为关键的是称吕原明是"安坐桥上"，而不是刘氏所云"安坐轿上"。

但与黄宗羲、李颙同时代的李光地，在提及吕原明坠水时，却由"乘轿"变成了"马行"：

> 一日马行，坏桥坠水几死，及起，却自咎曰："坠桥便坠桥，何为心动。⑧

由此而与吕原明叙其父吕公著骑马渡桥、桥坏而略无所伤之记叙相近。袁枚多次论及吕原明坠水事，一次据《黄氏日抄》立说，但只云"仆夫溺死不知"，⑨ 不及落水情形。另一次则在

---

① 朱熹：《伊洛渊源录》卷 7《吕侍讲》，《朱子全书》第 1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分见第 1010、1011 页。

② 黄震：《黄氏日钞》卷 50《读史》，"荥阳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08 册，第 340 页。

③ 张吉：《古城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57 册，第 674 页。

④ 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 2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30—31 页。

⑤ 张循认为"刘宗周的文字当然也是以《伊洛渊源录》为据的"，并断言刘宗周将朱子《伊》书中的材料改换顺序"拼接一处"，未必足信。

⑥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 23《荥阳学案》，中华书局，1986 年，第 903 页、907 页。

⑦《四书反身录》系康熙二十四年（1686）冬李颙与四方学者的问答，经由门人王心敬笔录而成，康熙二十五年由陕西学使许孙荃倡导，思砚斋刊刻，今可见之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173 册。

⑧ 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中华书局，1995 年，第 452—453 页。

⑨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 19《与程蕺园书》，《袁枚全集》第 2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332、333 页。.

《答某学士书》中说："吕希哲讲主静之学，至于肩舆过溪，舆夫坠水死，而安然不问。"① 晚清楼藜然在《峨眉纪游》中也曾论及吕原明坠水事，所述文字引自袁枚《答某学士书》。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吕原明坠水的叙事上，存在着如下情节上的差别：

渡桥的方式：一，马行；二，轿行；

溺水时的状态：一，"安坐轿上"、"安坐舆中"；二、"安坐桥上"；

溺死者：一，"从者"；二，"轿卒"；三，"仆夫"。

对于这些情节的差异不能仅仅从文献版本差异上评断何为正确，何为讹误，而应从历史叙事随时而变的特征去理解。由此而论，张循的"故意篡改说"与苗润博的"错误文本"、"正确文本"说恐都不无武断之处。推而论之，张、苗二文之前，杨武泉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也未必适当。早在 2001 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中，杨武泉即已有议论：

> 吕原明即吕希哲，为北宋宰辅吕公著之子，理学大儒程颐之弟子。其坐视舆人（轿夫）溺死而无所作为，且神色不变，确实不近人情。宋元明清道学家有此通病。不过，《总目》所述，与历史记载尚有出入。《宋元学案》卷二三《荥阳学案》云："（吕希哲）自历阳赴单父，过山阳渡桥，桥坏，轿人俱坠，浮于水，而公安坐轿上，神色不动，从者有溺死者。"可知是"安坐轿上"，非"安坐桥上"；溺死者为"从者"，非"舆人"。

杨武泉所说的"《总目》所述，与历史记载尚有出入"，语意模糊，正如前文所引证，关于吕原明坠水有多种记载，不知此处的"历史记载"指哪一则。杨对《提要》的两处辨误，被魏小虎吸收到其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第 2 册中。② 杨武泉的考证也是传统的文献学路径，与张、苗二人专从文献版本正误立说的思路一致。实际上，从吕原明坠水的多种叙事看，并无所谓绝对"正确的"说法。每一个叙事者在叙事时，无不融入自己的理解与认识，故在呈现出的情节上必然互有差异。

二、吕原明坠水叙事的两歧评说

据目前材料所见，最早记叙吕原明坠水一事的是徐积的《语录》，而徐积对此事的感叹是吕原明因德高而"神明阴相其德"，其《我敬》诗云：

> 我敬吕公，以其德齿，敬之爱之，何时已已，美哉吕公，文在其中，见乎外者，古人之风，惟贤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药有喜。

又自加批语说："前日之事，桥梁腐败，人乘蹉跌，而公晏然无伤，固有神明阴相其德，愿为本朝自重，生民自重。"③

从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七所引《家传》条评论"其自力如此"开始，吕原明坠水的故事开始被置于"定力"、"习静"的主题之下考量，因而出现了肯定与否定的两歧评说。

肯定者如赵善璙，将吕原明故事归入《自警编》卷二"定力"条，其褒扬之义甚为明显。在理学大盛时，理学家尤为重视涵养功夫，故"心动/不动"常常被视为涵养功夫到家与否的说辞。从宋代以降，吕原明"坠水不动心"的故事一直在理学家中广为传播，以至于刘宗周、李颙皆对吕原明"习静"的功夫赞赏有加。李颙甚至说：

> 学问得力与不得力临时便见。此公临生死而不动，世间何物可以动之乎？吾人居恒谈定

① 楼藜然：《峨眉纪游》，《虞初近志》卷 11，柯愈春编《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中），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年，第 565 页。

② 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156—1157 页。

③ 徐积：《节孝先生文集》卷 31，《语录》，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 年，第 719 页。

谈静，试切己自反此心，果定果静，临境不动如此公否。①

但在肯定之外，理学内部也有对吕原明“坠水不动心”的否定和批判。朱子虽也讲理学，但更多强调借助格物致知功夫明了普遍性的“理”，故对吕希哲侧重于“养心”的修养路径颇为不满，他批评说：

> 《吕公家传》深有警悟人处，前辈涵养深厚乃如此。但其论学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则博而杂矣。如云“直截劲捷，以造圣人”，则约而陋矣。举此二端，可见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于异学而不自知其非邪？而作此传者，又自有不可晓者，如云：“虽万万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为。”此类甚多，不知是何等语！又义例不明……岂其学无纲领，故文字亦象之而然邪！最后论佛学，尤可骇叹。程门千言万语，只要见儒者与释氏不同处。而吕公学于程氏，意欲直造圣人，尽其平生之力，乃反见得佛与圣人合，岂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资质之粹美，涵养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于道，而穷理不精，错谬如此。流传于世，使有志于道而未知所择者坐为所误，盖非特莠之乱苗、紫之乱朱而已也。②

朱子批评《家传》的作者“论学殊有病”，其主要意旨是斥责吕希哲本人“穷理不精”，染释氏习气而不自知，深恐吕氏学说流传后有害于“道”。

如果说朱熹对吕希哲的批评主要体现的是理学内部“理学”与“心学”分歧，那么，黄震的批评就带有强烈的朴素人性论色彩。黄震的批评靶的是《吕氏杂志》中的“不动心”，他批评说：公习静，至轿卒溺死，不为动。夫子厩焚，伤人之问，恐不其然？③

在黄震看来，对“轿卒溺死”而无动于衷，实在是违背孔子“马厩失火问人”的教诲，违背人之常情。

明代张吉（1451—1518）在所著《古城集》卷四《佛学论》中批评吕希哲溺于佛学，有一段与“客”的对话，与黄震相近。张吉说：

> 曰：原明溺于佛学如此，然其习静之功，虽惊恐颠沛未尝少动。尝过山阳渡桥，桥坏，舆人坠水，公安坐舆中，神色自若，此其恐惧不萌于心，所养不既深乎？曰：是则固守其中者，有以尸之所以为佛学也。临深登危，当谨于始，俾勿汔济濡其尾可也。不幸骤丁其变，躯命陨越之可忧，仆颠隮之可悯，乌得无惧。有所养者特不至于乱耳，此而不惧，则七情乃无用之物，临丧可以不哀，临乐可以不乐，凡百应接，心如死灰槁木，寂然无事，岂人之所宜为乎。④

“临丧可以不哀，临乐可以不乐，凡百应接，心如死灰槁木”，这些都违背了人之常情，因此，张吉认为是“非人所宜为”。

显然，在黄震、张吉的叙述脉络中，面对轿夫（舆人）溺水，吕希哲究竟是“安坐桥上”还是“安坐轿上”并非关键问题，他们争鸣的焦点是，在轿夫（舆人）溺水而亡之际，“心不动”究竟是一种什么行为，该如何评价？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以何种态度看待个体生命体验与严格的道德自律间的关系。清初李光地即批评吕希哲自咎坠桥心动说：“从此便在这上头加工。这便异端，不是吾儒正道。”⑤ 张循认为“这是理学家的歧见，我们可以不管”，似未能充分注意到李光地此一说法的立说语境。李光地是在“圣人之心，喜怒哀惧都有，但中节耳”的大前提下来讨论坠水“不动心”的，他认为吕原明早年拜师伊川（程颐），但是后来却“学佛”，才

---

① 李颙：《四书反身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173 册，据天津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五年刻本，齐鲁书社，1997 年，第 313 页。

② 《宋元学案》卷 23《荥阳学案》，黄氏补语引，中书书局，第 908 页。

③ 黄震：《黄氏日钞》卷 50《读史》，“荥阳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08 册，第 340 页。

④ 张吉：《古城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57 册，第 674 页。

⑤ 李光地：《榕村语录 · 榕村续语录》，中华书局，1995 年，第 452—453 页。

有坠水不动心之事，因此“不是吾儒正道”。在学生追问“使孟子际此，亦动心否”时，李光地明确说：“不动便是告子矣”。显然，李光地的说法是着眼于儒学传统来加以讨论的，并非简单的“理学家歧见”可以一言蔽之。

三、四库馆臣批评吕原明坠水不动心的思想意义

在厘清吕原明坠水的叙事变迁与评说的两歧后，四库馆臣批评吕原明坠水不动心的思想史背景清晰呈现出来。可以确定的是，四库馆臣并未有意篡改原文，更不是依据错讹版本对《四书反身录》进行评说，即使在吕原明坠水的叙事版本中，有“安坐轿上”与“安坐桥上”之分歧，但亦非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四书反身录〉提要》有什么样的思想史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对吕原明坠水不动心的叙事持的是批评立场。原文如下：

> 书中所引吕原明渡桥，舆人坠水，有溺死者。原明安坐桥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谓未尝动心。容称其临生死而不动，世间何物可以动之？夫死生不变，固足徵学者之得力。然必如容说，则孔子之微服过宋，孟子之不立岩墙，皆为动心矣。且厩焚必问伤人，乍见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舆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动，此乃原明平时强制其心而流为谿刻之过。容顾称之为不动，则于告子之不动心何异乎？是亦主持太过，而流于偏驳者矣。①

从思想源流上言，四库馆臣延续了朱熹、黄震、张吉、李光地等人的批评立场，其以“厩焚必问伤人”、“乍见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等说法和“舆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动”相对照，与黄震“夫子厩焚，伤人之问，恐不其然？”的反诘具有相同的思想渊源，都是对孔子以来儒家重视生命的一贯宗旨的继承与发扬，是一种朴素人性论的体现。而且《四库全书总目》对吕原明坠水不动心的批评，在乾嘉时期得到了袁枚的回应。在给程晋芳的信中，袁枚写道：

> 黄氏《日抄》称吕希哲习静，其仆夫溺死不知。张魏公自言有心学，符离之败，杀人三十万，而夜卧甚酣。宋学流弊，一至于此。恐周孔有灵，必叹息发愤于地下。②

袁枚将张浚“杀三十万人”③ 而“夜卧甚酣”与吕希哲睹仆夫溺死都视为理学的流弊，认为这样的行为与儒学宗旨根本有别。袁枚关注的是吕希哲“睹仆夫溺死不知”，而不是吕本人是“安坐轿中”还是“安坐桥上”。在《答某学士》中，袁枚又批评说：

> 更可笑者，张魏公败于符离，杀人三十万，而其子南轩夸家父有心学，故能寂然不动，鼾声若雷。吕希哲讲主静之学，至于肩舆过溪，舆夫坠水死，而安然不问。此种恶僧入定光景，于彼法为下乘，而晋、唐士大夫宗释氏者所未有也。④

袁枚形容张栻和吕希哲视人命如草芥，是“恶僧入定”光景，批评的重心仍然在于二人对周遭生命的漠视与冷酷，这与《总目》认为李颙津津乐道所谓“习静”功夫而“流为谿刻”的批评是相通的。在《咏史》中，袁氏再次论及吕希哲的故事：

> 东汉耻机权，君子多硁硁。悲哉陈与窦，谋疏功不成！其时凉州反，有人颂《孝经》。意欲口打贼，贼闻笑不胜。虽无补国家，尚未远人情。一变至南宋，佛行而儒名。希哲学主静，人死不闻声。魏公败符离，自夸心学精。杀人三十万，于心不曾惊。似此称理学，何处

---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16 页。

②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 19《与程蕺园书》，《袁枚全集》第 2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332、333 页。

③ 张浚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力主恢复，终至“符离之败”，可参阅何忠礼著《宋代政治史》第十三章第一节之“张浚北伐与符离之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17—423 页。所谓“杀三十万人”乃夸张说法。

④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 4《答某学士》，《袁枚全集》第 5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86 页。

托生灵。呜呼孔与孟，九泉涕沾缨。[1]（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袁枚的批评意见被晚清时期的楼藜然在《峨眉纪游》引述，楼氏还评论说："故论者谓宋儒先入释教中，明心见性，深造有得，然后变貌改形，遁而之儒，言虽偏宕，亦未始非空穴有以来风也。"[2] 今人蔡尚思也认为袁枚"批评得好"，他在引述袁枚的批评后，评论"习静"的修养方法说："这种修养方法，是愈'麻木不仁'愈'到家的'，简直等于饭桶、游民、死人、废物。"[3]

从官修的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四库提要》到知识界的袁枚和楼藜然，不约而同对吕原明"坠水不动心"加以批评，这种现象何以会发生？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从乾嘉以来的思想大背景中寻求答案。

明中期至清前期，理学已内化为一种伦理秩序，成为一种说教之词，"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4]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戴震、袁枚、焦循、阮元诸人，主张从人之本性的角度来肯定"人欲"，以救治理学意识形态化的弊端。戴震力主"遂情达欲"，发出"理学杀人"的疾呼，焦循谓之"戴氏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之义理"。[5] 钱穆认为戴震的立场"极平饶，还是同情弱者，为被压迫阶层求解放，还是一种平民化的呼声"。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观念"乃乾嘉诸儒之一般意见，而非东原个人的哲学理论也。"[6] 这股"极平饶"、"极平易"、同情弱者，反感理学僵硬生命态度的社会思潮也影响了官方的文化立场。在《四库全书总目》这部钦定目录中，存在大量与知识界相呼应，从人性角度对理学展开的批评。[7]

这种朝野相互呼应的文化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这股思潮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而不是孤立地、突兀地出现的。张寿安教授、张丽珠教授及周积明教授敏锐地关注到这股新思潮，开创了乾嘉"新义理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与路径。[8] 所谓乾嘉"新义理学"，按照周积明教授的界定，主要是指乾嘉时期居于主流的学术文化思潮，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力主达情遂欲，反对存理灭欲，要求以新的合情之理取代宋明压抑人情的"天理"；其二，通过"训诂明而后知义理"的为学程序，淡化传统"义理学"的"道德化"强势及"自由心证"的主观语境，突出学术的意义、实证的意义、试验或实测的意义；其三，从"言心言气言理"的形上"义理学"走向沟口雄三所指出的"社会的相关之理的创出"。[9]《四库全书总目》从多方面表现出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内在关联，潜含着无限丰富的"意义世界"，尚待进一步发现和开掘。

---

①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5《咏史》，《袁枚全集》第1册，第70页。

② 楼藜然：《峨眉纪游》，《虞初近志》卷11，柯愈春编《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中），第565页。

③ 蔡尚思：《宋明理学相同的缺点》，新中华杂志社编《中国传统思想之检讨》，1948年，第197页。

④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中华书局1961年，第5、10页。

⑤ 焦循：《雕菰集》卷7《申戴》，《焦循诗文集》，广陵书社，2009年，第125页。

⑥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页。

⑦ 兹举一例。南宋胡铨在流放岭南时恋上了一位名叫黎倩的女子，后来携黎倩北归，途中题壁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朱熹作《自警二绝》，批评胡铨"贪生莝豆不知羞，腼面重来蹑俊游"，又说"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袁枚认为胡铨是真性情、真丈夫，而朱子对胡铨的责难，不过是"腐儒矜然安坐而捉搦之"。四库馆臣也对朱子的批评表达了与袁枚相近的看法："铨孤忠劲节，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陈烈逾墙之遁，遂坐以自误平生，其操之为已蹙矣。平心而论，是固不足以为铨病也"。参见周积明：《"莝豆"与"梨涡"》，《光明日报》，2001－01－16。

⑧ "乾嘉新义理学"的探讨相关成果可参阅笔者与周积明教授合著之《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⑨ 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又载林庆彰、张寿安主编《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